



# 出自 积淤的 水中

——以贝劳音乐文化为实例的音乐学新论

[日]山口修 著

纪太平 朱家骏 译  
[日]仲万美子 橘田勋  
罗传开 校译

[日]山口修 著

# 出自 积淤的 水中

——以贝劳音乐文化为实例的音乐学新论

本书的翻译和校译得到了日本国文部省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研究成果公开促进费”的资助。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自积淀的水中:以贝劳音乐文化为实例的音乐学新论/(日)山口修著;纪太平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9

ISBN 7-5004-2553-8

I. 出… II. ①山…②纪… III. 音乐-艺术理论 IV. J6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6668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125 插页:5

字数:233 千字 印数:1—1000 册

定价:25.00 元

## 校译者的话

山口修教授是日本著名音乐学家，在国际学术界享有较高的声誉。山口修教授的论著，在20年前就被介绍到中国来了。27年前，日本音乐月刊《音乐艺术》于1972年10月号发表了山口修先生的《民族音乐与民族音乐学》。这篇文章由江明惇先生在1979年译出，我很高兴地进行了校译。译文最初刊登在1979年5月出版的《音乐译文》上，到1984年编译文集《音乐与民族》时，收入其中。

《音乐与民族》还收了山口修先生的《民族音乐·构成民族音乐的变数项目》和《民族音乐学》。这两篇都是1977年3月初版的《新音乐辞典（乐语）》上的大词条。前者原题《民族音乐》，译文的标题根据原文内容由译者拟定，最早发表在《音乐文摘》第7、8期的合辑上（1983年12月），后收入《音乐与民族》。

如上所见，山口修先生的文章在20年前就传入我国。进入80年代，日本音乐学界的一件大事是，平凡社出版发行了《音乐大辞典》。其第一卷于1981年10月20日初版第1次印刷；第五卷于1983年8月15日初版第1次印刷。我最感兴趣的大词条“民族音乐学”登在第五卷上，由山口修先生执笔。迫不及待地到图书馆借阅后，我认为对我国的相关学科很有参考价值也就动手翻译了。当时人民音乐出版社正在规划编辑出版《音乐词典词

条汇编》丛书。在第一批选题中就有民族音乐学。在1988年11月出版的《民族音乐学（音乐词典词条汇编）》中，这篇中文译稿全文4万字，占了半本书以上的篇幅。我深信，学术价值较高的这篇论文，会使读者的视野更加开阔，能更广泛地了解国外在这方面的音乐学术信息，并有助于我们借鉴外国同行在有关专题上进行研究探索的经验。

进入90年代后，山口修教授在中国的学术活动更为活跃，对此已有介绍，这里不再重复。我对最近仍有机会为山口修教授论著的中译本进行校译，颇感荣幸。相信中译本将对我国音乐学术界产生良好影响。

罗传开

1999年4月

## 为山口修君《出自淤滞的水中—— 以贝劳音乐文化为实例 的音乐学新论》中文版而作

当我听说山口修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出自淤滞的水中——以贝劳音乐文化为实例的音乐学新论》中文版即将与读者见面时，真是高兴极了。我想起了他近些年两度到中国并在音乐研究所做学术报告的场景，想起了每次见面时对我流露出的兄长般的关怀。当然，更让我难以忘却的，是80年代初我第一次拜读他撰写的《民族音乐与民族音乐学》、《民族音乐：构成民族音乐的变数项目》及为《新音乐辞典（乐语篇）》所写的词条《民族音乐学》（均为罗传开先生译）等三篇精彩论文时的特殊感受。那时，中国社会正处在迈向现代化的大变革初期，诸类人文学科百废待兴，民族音乐研究领域也正在重新寻求起步的机会。将近20年的隔膜使我们对国外同类学科的状况毫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读完他的宏论，我就像是一个被窒息了很久很久而突然呼吸到新鲜空气的人，如沐春风，如观海潮，如置高原大川！久违的对事业、学术的追求，潜于心底的思考力，被压抑的想象力以及对中国传统音乐丰富资源的自豪感，全都为此而活跃起来，并充满我的身心。这时，我也才强烈地意识到，相互交流对于学术的

发展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现在，山口教授的大作，又要与中国同行见面了，这将是中日民族音乐学之间的一次更为深广的交流。为此，我要衷心向作者、译者、校译者致意、祝贺，更希望中日民族音乐学家广泛合作，携手迈入 21 世纪！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乔建中**

1999 年 3 月 20 日

## 音乐学的新视角,出自积淤的水中

贺山口修先生新作在华出版

山口先生是我的挚友。我敬重他如兄长,不只因为他长我一岁,更因为他的道德学问。

我最初知道山口,是70年代末,读到他的文章。他对音乐学的见解,我深有同感。所以后来,一直留意他的发表。1984年在《民族音乐学译文集》前言中我说:中日两国“作为都是东方国家,加上种种历史原因,在如何看待和吸收欧美民族音乐学成果方面,确有很多相似的背景”,所以,“加强同日本的交流具有特殊的意义”。其实,我的这番感慨,一半来自岸边,一半就缘于山口。

日前,欣悉山口先生来信,说他的博士论文《出自积淤的水中——以贝劳音乐文化为实例的音乐学新论》即将在中国出版。这就再度引发了我类似的感想:贝劳是西太平洋群岛中一个不足500平方公里的岛国。山口先生从研究“贝劳音乐文化”的微观出发,向日本音乐学“继承国学、汉学传统的潮流”和大量接受“一般西洋学”、“西洋式‘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的潮流”同时提出了挑战,以期“开辟出一条使‘音乐学’获得更为中肯的定义的途径”,显然是充满勇气,面向未来的。而我,自1985年以来,反复踏上基诺山这片掩映在西双版纳密林深处仅600平



方公里的神秘土地，则是为了体认和寻求一条朴实的、重返音乐本源和音乐认知的回归之路。表面上彼此的意图似乎正巧相反，其实结果一样。只因彼此经历和处境不同，各自相背走去，但终将在同一点上相遇。中国人称“殊途同归”；也应了贝劳人“过去即是将来”的谚语。当然，此番又是兄先我而行了。

想到不久就能读到这部大作，非常兴奋。因我知道，山口先生的文章总是那样地富于睿智和充满灵性。相信一定也会深得我许多中国同道的喜欢，并从中得到启迪。

沈 洽

己卯仲春于北京丝竹园

## 中文版前言

### 从混沌中提取出来的本质

从1999年到2000年的这一期间注定要在我的人生中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是因为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出版个人的著书，并且是两册相继刊行。首先是今年9月预定出版的本书，然后是将于明年3月出版的《应用音乐学》（广播大学教材）。这两本书都带有着在自己人生的一个分节点上，将我作为音乐学者历时30年左右所经历、考察过的内容加以总括的意图，但在其主要的方向性这一点上却略有不同。亦即在本书中，在强调“从过去到现在”的同时，还包含有洞察“未来”的愿望；与此相对，另外一书则在以“过去”为依据的同时，毋宁将其重点放在“从现在朝着未来”移行的人及其文化上面。

虽然这第一本书的原稿是日文，其出版却是以中文来实现的一事对我来说是富于启示的。这是因为中文的文字排列对于我不啻正是“混沌”本身，而另一方面，对于读者们来说却应该是作为本书之基调的“褒义的混沌”。也就是说，我确信如果是具有洞察力的读者的话，将能够从混沌之中读出其本质来。在翻译工作基本完成、与出版社的合作即将开始的“现在”，我回想起从初期阶段至今参与这一计划的各位的献身的、诚挚的态度和实际工作状况，这种确信就变成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确信而充满我的心

中。(为什么要强调“现在”一词呢?在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其答案将会作为本书的一个要点而得到理解吧)我感觉到我自己在与人合作翻译别的书时,原著者寄来的“日文版前言”中的一段话几乎原封不动地表达了我现在的心情。“由于我自己……曾经做过翻译的工作,因此,对于此类翻译中必然要有的、花费时间的在细小的枝节上极为麻烦的过程是深有体会的。优秀的翻译家谙悉原著者的著作,能够细致地读出其意思的细部、意味及带有情绪的态度等的阴影,察知寄托于原著者声音中的感情。因此,我感到翻译是特殊的人际关系的隐喻”(FELD 1988: 8)。

本书的中文翻译始于龚林的令人感动的单独作业,但因为他自己的学位论文写作及演奏活动需要时间,不得不放弃而无法坚持到最后。不管怎么说,首先应该对他表示深切的敬意。由于业已体验到翻译工作应该由数人组成的小组来进行方能取得较好的成果,在我看来,最终由朱家骏、仲万美子和橘田勋三位以献身的精神来完成这项工作,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亦即在中国攻读日语学,而后在大阪大学攻读了音乐学的朱家骏从以汉语为母语的立场出发,成为翻译工作的主体。他对后述的纪太平先生的译文初稿做了细致的修改,并最终对整个译稿的完成负责。而在日本攻读过汉语学,又在大阪大学攻读音乐学的橘田勋以及迄今为止一直攻读音乐学,从跨学科的角度来研究东西方文化接触的仲万美子则分别从以日语为母语的立场出发,对原文与译文做了严密的对照,努力使原著者的意图和细微的含意反映到译文中来。通过各具不同研究经历的他们三位的这种互为补充的作业,终于实现了基于对原文的深刻领会的出色翻译。还有属于本研究室的金士友、薛罗军和张雷等各位也从年轻的中国人读者的立场上对翻译工作给予了关心。鉴于这种翻译工作过程,我认

为本书就是曾隶属于本研究室的许多中国音乐研究者的共同心愿。如果再考虑到对于整个工作过程给予热情关注的研究室所有其他人的话，也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研究室整体的伟业。此外，业已完成学业离开本研究室的赵维平、井口淳子等，以及不久即将入学的李金叶等新生们尽管未能直接接触到翻译的现场，但我想他们一定也会在本书实际得以问世的过程中给予协助吧。

实际上，翻译工作并不仅仅局限在研究室内部来进行。首先，作为日语教育和翻译工作者，具有丰富经验的厦门大学日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纪太平先生从非音乐工作者的角度出发，以易为一般读者理解的形式完成了翻译的初稿，为整个翻译工作奠定了基础；还有原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罗传开先生在最后的阶段从专业上做了校译，更进一步提高了本书的价值。尤其是罗传开先生从很早起就将我的著述介绍给了中国的音乐学界。此次，尽管尚未能完全离开病榻，为该书承担了校译的重任。在此，谨对纪太平先生、罗传开先生和为本书写了推荐文章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乔建中教授、中国音乐学院的沈洽教授表示感谢。

回想起来，中国和我的直接关系可以追溯到1978年。我与已故小泉文夫先生和德丸吉彦先生一起完成了在乌兰巴托的工作后乘坐列车越过国境，在二连站内等候列车将窄轨换成宽轨的时候，我们品尝了中国菜。在起自乌兰巴托的漫长旅途中实际感受到了“大陆”的我，驰思路途遥远的北京，预感到了中国和我的关系未来必将日益巩固。现在看起来，走向中国的第一步并非起自大城市，而是边境小镇一事具有启示的意义。我一向坚持主张不要拘泥于文化的中心部分，而应该对边缘部分做均衡的关注，这对于新的学问是必须的。但实际上，那以后却仅能对北京、上海、香港做了体验，所以是不平衡的。我梦想着能到东北各省或

新疆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去。但愿本书能够早我一步，得到在中国国内各地或散居于世界各地的众多能够理解中文的音乐研究者或专业以外的人们的关注；并且，怀着对曾给予我的学生们以厚谊的许多人的感谢，怀着对在此不可能一一列举姓名的众多的与中国有关的前辈和友人们的深切怀念之情，谨写下以上文字作为本书中文版的序言。

山口修

1999年3月下旬

巡游“积淤”文化之地马来西亚、越南后，于大阪

## 前 言

在密克罗尼西亚的贝劳〔旧称南洋群岛帕劳（Palau）诸岛〕从事田野工作以来，匆匆间四分之一世纪的岁月已经逝去。其时按联合国会议作为太平洋托管区（U. S. Trust Territory of the Pacific Islands）的帕劳尚处于美利坚合众国的保护伞之下，而现在至少在形式上已经以“贝劳共和国”（Republic of Belau）的名称宣布“独立”了。

尽管国内民族意识高涨，但苦于陷入“现代化”的政治组织与传统的社会结构间的矛盾之中，经济方面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美国，在国际社会中也很难说已经得到充分的认识。和密克罗尼西亚的其他地区相比，原本就比较开明的贝劳，于1981年，在政治上与其他地区相脱离，成立了自治政府。但是，宪法中所规定的“无核原则”与企图承认对于稳定经济来说最为有效的“与美国的自由联合形态”，即承认“基地建设”的动向发生了矛盾，在国民之中尚未充分达成共识，实际上，目前仍然处于美国的托管状态之中。贝劳虽是一个仅有一万数千人的小社会，但已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并一直传承了下来。为要达到“现代化的国家建设”的目标，贝劳还得走一段曲折坎坷的道路。

位于密克罗尼西亚最西端的这个岛国，现在的确是日本人可以自由往来的观光地。但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当时战后的气氛

还很浓厚，如果没有特别许可的话，日本人要进入该地区是不可能的。那时我正在夏威夷大学研究生院学习，由于得到指导教官巴巴拉·B·史密斯（Barbara B. SMITH）教授（现为名誉教授）的建议和推荐，我遂得以前往该地。其理由之一固然是因为当时40岁以上的人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这一事实，然而，更为重要的还是由于当地关于音乐学方面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一事令人担忧。当时，史密斯教授已完成了对密克罗尼西亚整个地区的概略调查工作，她毫不犹豫地把我与该地区联系在一起了。此外，我作为檀香山东西中心的“学生交流计划”奖学生这一点也是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至此，我的调查研究，或者说我的第二个留学的准备工作就都就绪了。

在贝劳生活8个月的成果，决定了我作为音乐学者的人生道路。我在日本生长，到美国留学，而后又在另一个地方接触了不同的文化。这种错综复杂的学习与生活体验正是我作为一个研究者的出发点。离开两处异乡之地后，我回到故国就职。在20世纪后叶国际化不断推进的日本的各样经历，又促使我的音乐研究生活更加富于成果。渐渐地，我终于站到从全球的视野来考虑音乐的立场上来了。换句话说，我开始感到有义务对我所从事的音乐学研究今后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題，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加以发表。

适值1990年7月，第四届国际音乐学会学术研讨会SIMS 1990 ÔSAKA（Fourth Symposium of the International Musicological Society）在大阪召开，会议的会务处就设在大阪大学音乐学研究室。因而，我个人也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进一步扩大和国内外专家们的交流，并得以从整体上来对音乐学做出展望。在会议准备工作繁忙的1989年底，我花了两周的时间离开日本，再次前往贝劳。因为我很希望有哪怕是片刻的时间也好，能够从时

间上、空间上脱离情报信息越来越灵通的我的“现在”的状况，再去回顾一下自己的过去。尤其是要把那对于我来说无可替代的在贝劳的体验与“我自己的现在”相比较的话，就很有必要了解“贝劳的现在”。

这里所提示的是我的这种思想经历的结果的一部分。即第一，按我的理解给音乐学重新下定义；第二，探讨以贝劳文化作为音乐学的研究对象时，作为基本的问题，应该将其摆在何种地位；第三，依据第一、第二的框架，较为具体地记录论述贝劳的音乐文化。我想通过以上作业来探索一下音乐学、贝劳文化以及我自己的“将来”。

山口修

1990年12月

## 附 言

本书是我立志从事音乐学研究近30年来作为人生道路上的旅程标的著作，因而，也是我迄今有过许多机会写下的有关内容的总结。事实上，对于过去已刊登过的我自己的文章，在此尽管作了大幅度修改，但用了很多（特别是山口修 1967；1968b；1969a；1969b；1982a；1983b；1984；1986b）。在此，我想对允许我做这种修改的出版社表示感谢。

尽管我的过去，在本书中有着极为浓厚的反映，但是全书的主体框架还是“我的现在”的思考。而且，为了预见未来，我想对过去和现在作一下对照。正如本书的题目“出自积淤的水中”（水の淀みから【Mizu no yodomi kara】）所暗示的，贝劳文化的本质是从“积淤的水中”提取出来的那样，我惟愿文中的关键词——“作为构造的混沌”，在交杂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同时也表现着我自己的未来。



## 译者附言

在本译文的翻译过程中，有关固有名词的表记及注释等基本上力求保持原文的形式，但从译文的风格出发，亦有一些在征得原著者的同意后作了变更的地方。因此，谨在此对包括贝劳语等外国语的处理方式在内的翻译原则略加说明。

### 1) 贝劳语的处理

有关文中的贝劳语表记，对于固有名词原则上用汉字（音译）来表记，并在各章中的第一次出现时附上原文。对于体裁名等专业用语则基本上只用原文，仅在各章中的第一次出现时附上汉字的音译表记。

贝劳语的汉字音译表记在得到原著者确认的基础上，力求忠实于贝劳语的发音。对于频繁出现的模糊元音 e，由于与其前后的辅音、元音的关系所导致的音色的变化，其表记亦不一定统一。有关贝劳语的语音，请参见卷末附录 1 贝劳语音声学、标记法。

文中及附录歌词集的贝劳语歌词的翻译，亦在得到原著者确认和参照其英文翻译的基础上依据日语译出，因此并非依贝劳语直接译出。

附录 5 的分类学表援用自日文出版物，为了帮助读者阅读对